

基于阐释学视角下《荷塘月色》英译本中模糊语言表达翻译策略研究

——以朱纯深、杨宪益与戴乃迭、葛浩文译本为例

唐佳毅, 谭 平

贵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9日

摘 要

本文以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为框架, 结合模糊语言学的相关界定, 选取朱自清散文《荷塘月色》的朱纯深、杨宪益与戴乃迭及葛浩文三个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旨在系统探究阐释学运作机制在模糊语言翻译过程中的体现与作用。通过对比分析三个译本在处理情感心理、数量范围、意象感官等各类模糊语言表达时所采用的策略, 本文发现: 译者在“侵入”阶段对原文模糊性的个性化解读, 深刻影响了其在“吸收”阶段的方法抉择, 如具体化、意象转换或以模糊译模糊等; 而最终的“补偿”环节则成为恢复译文平衡的关键, 三位译者分别侧重于意象质感的重现、情感强度的递进或氛围感的补偿营造等不同维度进行创造性补偿, 以弥补转换过程中的意义或美学损失。研究表明, 斯坦纳的阐释学理论为分析和评价文学翻译, 特别是模糊语言的处理, 提供了一个能够完整描述译者动态决策过程的、立体而深刻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阐释学, 模糊语言, 翻译策略, 《荷塘月色》

A Study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Fuzzy Language Expressions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Lotus Pond by Moonl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s by Zhu Chunshen,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and Howard Goldblatt

Jiayi Tang, Ping Tan

Abstract

Framed within George Steiner's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and incorporating the definition of fuzzy language,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Zhu Ziqing's prose *The Lotus Pond by Moonlight* by Zhu Chunshen,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and Howard Goldblatt. It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manifestation and role of the hermeneutic mo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fuzzy language. Through a detail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three translators in handling various types of fuzzy language expressions—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emotion and psychology, quantity and scope, imagery and sensation—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translators' personalized interpretation during the "Aggression" stage profoundly influences their strategic choices at the "Import" stage, such as specification, image transformation, or using fuzzy for fuzzy. The final "Compensation" stage emerges as crucial for restoring equilibrium in the target text, with the three translators focusing on different dimensions—be it the reproduction of imagistic texture, the gradation of emotional intensity, or the compensatory construction of atmosphere—to creatively compensate for the semantic or aesthetic losses incurred during transfer.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Steiner's hermeneutic theor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profound, and dynamic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particularly the handling of fuzzy language.

Keywords

Hermeneutics, Fuzzy Languag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Lotus Pond by Moonligh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瑰宝,其语言优美,意境朦胧,文中大量使用了增强韵律感、意象感和情感张力的模糊语言表达[1]。模糊语言表达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其“不确定性”和“语义变异性”恰恰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近年来,对《荷塘月色》英译本的研究方兴未艾,或从关联理论探讨翻译策略,或从译者主体性分析词汇翻译,或从翻译美学角度来赏析译文。然而,将阐释学翻译理论系统应用于多个译本模糊语言表达翻译的对比研究尚显不足。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提出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尤其是其核心的“理解即翻译”观点及“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步骤,深刻揭示了翻译作为一种阐释行为的本质。这一理论框架直面了译者理解的主观性及跨语际转换中的失衡与再平衡问题,适用于分析《荷塘月色》中模糊语言表达的翻译过程。

本文旨在融合阐释学翻译理论与模糊语言学研究,选取朱纯深、杨宪益与戴乃迭及葛浩文这三个在翻译理念与风格上各具特色的英译本,系统考察译者如何在斯坦纳所述的阐释循环中,理解、处理并再现《荷塘月色》中的各类模糊语言表达,并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翻译策略选择与动因,以期对文学翻译实践与批评提供新的启示。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西方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

西方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深刻演进, 其思想脉络为分析文学翻译中的模糊语言现象提供了重要基础。该理论传统的奠基者可追溯至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 他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Übersetzens)中首次将翻译问题提升至哲学层面, 提出的“归化”与“异化”二元模式确立了译者在理解与再现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2]。

20 世纪中后期, 阐释学翻译理论迎来重要发展。乔治·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中系统提出的“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步骤理论, 将翻译描述为一个动态的阐释循环, 为分析文学翻译过程提供了操作性框架。与此同时,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翻译本质的理解, 强调理解是译者视域与文本历史视域的创造性对话过程[3]。

进入当代, 阐释学翻译理论呈现出与其他理论思潮深度交融的趋势。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通过揭示意义的“延异本质”, 为处理文本不确定性开辟了新视角。保罗·利科提出的“语言好客”概念, 则在承认翻译必然存在意义损益的前提下, 为跨语言实践建立了伦理框架。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 可视为施莱尔马赫异化策略在当代语境下的深化与发展[4]。

值得注意的是, 数字人文的兴起催生了“数字诠释学”这一新兴交叉领域。研究者开始运用计算方法分析大规模平行语料, 通过情感分析、语义网络可视化等技术, 为传统的文本阐释提供数据支持, 展现出阐释学翻译研究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方向[5]。

2.2. 阐释学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引介、接受与发展

阐释学理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传入中国, 并迅速在中国翻译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学者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与开创性的应用, 早期代表性著作如杨武能(1987)《阐释、接受与创造的循环》提出“翻译家就是阐释者”[6]。

进入 21 世纪, 相关研究呈稳步上升趋势。根据文献统计, 截至 2025 年, CNKI 上以“斯坦纳阐释学”为主题的文献有 645 篇, 其中学位论文 351 篇, 基金项目 28 项, 显示出较高的研究热度。研究主题高度集中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上[7], 该理论被广泛用作评估译本的新标准, 并指导各类文本的翻译实践。然而, 其应用也存在局限性, 如研究多集中于译者主体性, 对海德格尔、施莱尔马赫等奠基性理论的深入研究不足, 且批判性应用不够, 可能过分强调译者主体性而忽视文本意义[8]。

尽管前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将其系统应用于《荷塘月色》模糊语言表达的翻译研究, 仍存在可深化之处: 其一, 既有研究多侧重于理论框架的构建或译者主体性的宏观探讨, 未能紧密结合斯坦纳的“四步骤”循环对译文进行细致的微观对比; 其二, 在《荷塘月色》的多译本研究中, 针对各类模糊语言如何在不同译者的阐释循环中被处理、转化与补偿的系统性考察尚显不足。

综观上述研究, 学界对《荷塘月色》英译本的考察大致形成三条路径: 语料库文体学路径(刘爱军, 2020; 霍跃红, 2011)[9][10]长于量化描写词汇、句式与情感词特征, 但难以解释统计差异背后的译者理解与决策过程; 翻译美学路径(杨玉兰, 2008; 童兆升等, 2009; 杨昊, 2015)[11]-[13]对朱纯深译本的审美再现分析精细, 但多将译者选择视为静态结果, 且常集中于单一译本; 翻译方向与忠实研究(黄立波, 2011; 陈顺意, 2021)[14][15]分别揭示了译入/译出差异和“忠实”的复杂性, 但前者目标在翻译方向本身, 后者未将模糊语言作为独立美学范畴。换言之, 既有研究已经回答了“译文有什么特征”、“审美效果如何”、“是否忠实”等问题, 却尚未系统回答“译者在模糊语言面前如何理解、为何如此转化、又如何补偿”。本文以斯坦纳“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步骤为框架, 正是要补足这一动态阐释维

度：它不以量化统计或静态审美判断为终点，而是追踪三位译者在情感心理、数量范围、意象感官三类模糊表达中的决策轨迹，并据此反思阐释学理论在模糊语言翻译中的解释力。

3. 理论框架

3.1. 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及其对模糊语翻译的启示

乔治·斯坦纳在《巴别塔之后》中系统阐述了阐释学翻译理论[16]，将翻译过程描述为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四步骤循环：

(1) 信任(Trust)：译者相信原文是严肃、可理解的，且有翻译价值。这是一切翻译活动的起点。对于模糊语而言，这意味着译者相信其模糊性并非缺陷，而是有意为之的艺术手段，值得在译文中尽力传达。

(2) 侵入(Aggression)：译者主动地、甚至带有“侵略性”地深入解读原文，挖掘其文化内涵和语义结构。斯坦纳认为“理解即翻译”，且理解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必然会带入译者自身的环境、水平和文化素养。在处理模糊语时，这一步骤尤为关键，因为模糊语的“不确定性”为译者的个性化“侵入”和解读提供了广阔空间。

(3) 吸收(Import)：译者将解读后的意义与形式“吸收”并移植到目的语和文化中。此过程可能使原文内容根据译入语的需要被改变，对母语来说是“潜在的溶解和重置”。对于模糊语，是保留其模糊性，还是将其明晰化，便是在这一阶段做出的战略抉择。

(4) 补偿(Compensation)：由于“吸收”过程可能造成原文内容、形式或美学的失衡，译者必须通过种种手段进行修复，以恢复整体译文的平衡与和谐。斯坦纳认为“恢复平衡即为译者的道德”。在模糊语翻译中，补偿可能体现在音韵、意象、情感强度或文化联想等多个层面。

在模糊语言翻译中，四步骤是一个相互渗透的阐释循环。第一，“信任”的对象不是某一确定含义，而是多个可能含义共存的张力，即原文“言之未尽”。第二，“侵入”与“吸收”并非先后分明的两步：目的语的可表达范围从一开始就参与塑造译者的解读焦点，译者对“青”的理解已受 blue/green 选项牵引。第三，“补偿”的空间在“侵入”阶段便已被划定：朱纯深若未在理解“田田”时捕捉到柔滑质感，补偿阶段便不可能出现“silken”。因此，本文将四步骤作为分析性参照，案例分析重点关注哪一环节构成决策枢纽，以及各环节如何相互修正。

3.2. 模糊语言的界定与分类

模糊语言作为人类语言交际的普遍现象，其本质在于语义边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精确性[17]。在文学翻译研究中，模糊语并非语言的缺陷，而是一种重要的美学资源，能够通过其“不确定性”和“语义变异性”创造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18]。

在翻译策略层面，研究者普遍认同“以模糊译模糊”与“以精确译模糊”是处理模糊语的两大核心策略导向[19]。前者旨在保留原文的模糊美感与开放性，如将“around ten o'clock”译为“十点左右”；后者则在必要时进行明晰化处理，以确保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这两种策略的选择，往往取决于译者对原文语用功能的判断以及对目标语读者接受度的考量。

从理论发展来看，扎德(L. A. Zadeh)于1965年提出的模糊集理论为理解语言中的模糊现象提供了数学基础，该理论认为概念边界的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在翻译研究领域，这一理论启发了对翻译过程中不确定性决策的深入探讨[20]，有学者进而提出“模糊性定律”，强调文学翻译的本质是在源语与目标语的模糊性之间进行创造性转换。

就分类体系而言，学术界基于语言层次与语义功能提出了多种分类框架。从语言层次看，可分为词汇模糊、句法模糊和语篇模糊；从语义内容看，则包括数量模糊、程度模糊和类别模糊等[21]。

结合《荷塘月色》的文本特点, 本研究主要采纳按语义内容与语言形式相结合的分类方式, 重点考察文中的情感与心理状态、数量与范围以及意象与感官三类模糊表达:

(1) 情感与心理状态的模糊表达: 如“颇不宁静”、“淡淡的”、“阴森森的”、“迷迷糊糊”等, 这些词语边界模糊, 高度依赖译者主体的情感体验。

(2) 数量与范围的模糊表达: 如“一番”、“一条”、“一些”、“一层”、“几段”等, 这些词语表达的是不确定的数量或范围。

(3) 意象与感官的模糊表达: 如“青雾”、“碧天”、“凝碧”等, 其色彩、形态、质感在感官体验上是连续和难以精确界定的。

4. 阐释学视角下模糊语言表达的翻译分析

本章将依据前文界定的模糊语分类, 对三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在每个案例中遵循阐释学的动态循环, 分析译者如何从初始的信任出发, 经由个性化的侵入进行解读, 在吸收阶段做出策略抉择并最终通过补偿手段恢复译文平衡, 从而完整呈现模糊语翻译的阐释全过程。总体来看, 三位译者对《荷塘月色》原文价值的“信任”是毋庸置疑的。该信任在于相信原文的可译性, 更在于相信文中那些看似朦胧、不确定的模糊语言正是构筑其独特美学境界的核心要素。他们相信, “淡淡的”月光、“脉脉的”流水、“阴森森的”小路, 这些模糊表达所蕴含的情感与意境, 是值得并且必须通过再创造传递给英语读者的。正是这份初始的“信任”, 支撑他们面对翻译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即模糊性的传递, 而非选择简单化的规避。

4.1. 数量与范围模糊表达的翻译: “几段空隙”

原文: 只在小路一旁, 漏着几段空隙。

朱纯深译: Only on the path side can two or three gaps be seen through the heavy fringe, as if specially reserved for the moon.

葛浩文译: ...only on the side of the path are there gaps, here and there showing through, seemingly left there just so the moon can shine in.

杨宪益&戴乃迭译: ...the only small clearings left being those by the path, apparently intended for the moon.

“几段”的模糊性, 在于其不求精确, 只为勾勒意境。三位译者对此心领神会, 但解读焦点不同。朱纯深把“几段”读作数量问题, 于是吸收为“two or three gaps”, 将模糊数量具体化。这一处理使画面更清晰, 却压缩了原文的数量模糊空间。为了弥补这一损失, 他在句末添加“as if specially reserved for the moon”, 以拟人化比喻重新打开想象空间。这一补偿与他“几段”的解读方式密切相关, 先把模糊数量具体化, 再用诗意比喻进行平衡。

葛浩文则把“几段”读作空间分布问题, 而非数量问题。他没有给出数字, 而是用“gaps”对应“空隙”, 再以“here and there”补偿数量的不确定性。这一表达既保留了原文的模糊感, 又符合英语惯用表达, 使画面呈现疏落有致、时隐时现的效果。在这里, “吸收”与“补偿”几乎合一: “here and there”既是吸收原文模糊数量的手段, 也是补偿英语读者可能无法从“gaps”中感受到疏密分布的表达策略。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路径又不同。他们把“几段”读作空间属性问题, 于是跳出数量框架, 将“几段空隙”吸收为“small clearings”, 侧重于小路旁被月光照亮的空地的空间特征。随后, 他们用“apparently intended for the moon”补偿原文的拟人化意趣, 使译文在放弃数量模糊的同时, 保留了“似乎为月光所留”的诗意。

朱纯深的补偿预设于侵入阶段, 葛浩文的吸收本身即补偿, 杨氏夫妇则以属性转换替代数量对应。

刘爱军(2020) [9]的语料库统计曾指出葛浩文在英语惯用表达上具有母语优势, “here and there”正是这一优势的体现。但母语优势只能解释他“能够”使用这一表达, 不能解释他“为何”选择保留模糊性而非像朱纯深那样具体化。真正决定这一选择的, 是他对“几段”的解读侧重空间分布的疏密感, 而非数量的不确定性。从阐释学角度看, 侵入阶段的解读焦点才是策略差异的枢纽。

4.2. 情感与心理状态模糊表达的翻译

4.2.1. 情感基调: “颇不宁静”

原文: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朱纯深译: I have felt quite upset recently.

葛浩文译: These past few days I have been exceedingly restless.

杨宪益&戴乃迭译: The last few days have found me very restless.

“颇不宁静”四字为全文奠定了情感基调, 其模糊性在于它只可意会的心理状态。“颇”是一个模糊程度副词, 可表示“相当”, 也可表示“非常”; “不宁静”则可在“烦乱”、“不安”、“焦躁”等语义之间滑动。三位译者都信任这一情感基调的核心地位, 但“信任”本身并不规定解读方向。朱纯深把“颇”读作“相当”, 把“不宁静”读作内在的烦乱, 因此选择“quite upset”, 情感强度相对克制, 重心落在情绪的低落与烦乱上。葛浩文把“颇”读作“非常”, 把“不宁静”读作外在的不安, 因此用“exceedingly restless”, 情感强度最高, 重心落在身体与精神上的躁动不安。杨宪益与戴乃迭取“very restless”, 强度居于两者之间, 既保留了“不安”的外在表现, 又以“very”传达出直接而明确的情感力度。

从“侵入”和“吸收”关系看, 三位译者的差异并非简单的词汇选择差异, 而是解读焦点差异在吸收阶段的自然延伸。朱纯深的“upset”更偏向情绪上的烦乱, 葛浩文的“restless”更强调坐立不安的状态, 杨氏夫妇的“restless”与葛浩文接近, 但程度副词“very”使其情感强度低于“exceedingly”。这里的“补偿”是隐性的, 它内化于形容词与程度副词的选择之中: 朱纯深以“quite”保留原文的克制与含混, 葛浩文以“exceedingly”强化情感张力, 杨氏夫妇以“very”取得中间平衡。每位译者都在用自己选择的词语与程度, 复原他们心目中那个最真实的情感原貌。

霍跃红(2011) [10]的情感词汇分析曾注意到朱纯深译本偏好克制的情感表达, 杨氏译本用词更趋直接。这一观察与本案例的程度副词选择可以互相参照, 但词汇统计能看到“quite”与“exceedingly”的不同, 却无法说明这种不同从何而来。从阐释学角度看, 差异的根源在于三位译者对“颇”这一模糊程度副词的解读本身就不同。更重要的是, 信任阶段只确认“颇不宁静”值得翻译, 却不决定其翻译方向; 真正决定方向的是侵入阶段对“颇”与“不宁静”的个性化解读。吸收阶段的选词, 则不过是这一解读的外化。

4.2.2. 环境感受: “阴森森的”

原文: 没有月光的晚上, 这路上阴森森的, 有些怕人。

朱纯深译: The foliage, which, in a moon-less night, would loom somewhat frighteningly dark, looks very nice tonight, although the moonlight is not more than a thin, greyish veil.

葛浩文译: On moonless nights this path is dark and forbidding, giving one an eerie feeling. But this evening it was quite nice, even though the rays of the moon were pale.

杨宪益&戴乃迭译: On nights when there is no moon the track is almost terrifyingly dark, but tonight it was quite clear, though the moonlight was pale.

“阴森森的”描绘的是一种氛围, 一种心理感受。三位译者都相信这种氛围必须传达, 但在侵入阶段的解读强度与焦点不同。朱纯深的处理最值得注意: 处理“这路上”时, 将视觉与心理重心转移到“The foliage”上, 写树叶在无月之夜“would loom somewhat frighteningly dark”。这说明他在侵入阶段关注的是“暗”的视觉来源于“怕人”的心理效果, 而非“路”本身的物理属性。他用“somewhat”保留了原文的模糊感, 又用“frighteningly”点明“怕人”的心理因素, 其吸收与补偿几乎同步完成: 一方面把“阴森森”吸收为“frighteningly dark”, 另一方面用“somewhat”防止情感过度, 用“looks very nice tonight”形成今昔对比。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almost terrifyingly dark”则是一种强度更高的侵入。“terrifyingly”一词赋予了小路几乎令人恐惧的特质, 情感强度明显高于朱译。其补偿体现在“almost”上: 它把恐怖感推向极限的同时又稍稍拉回, 使译文不至于过度确定。这个“almost”并非简单程度副词, 而是忠实于“阴森森的”这一模糊氛围所包含的“接近恐怖但尚未到达”的不确定性。葛浩文的处理则更显直白: 他先用“dark and forbidding”定下基调, 再补充“giving one an eerie feeling”来解释“怕人”。这种分步式吸收策略, 正是为了补偿英语读者可能缺失的语境体验, 以确保情感的准确传递。“eerie”一词既保留了阴森感, 又避免了“terrifying”那样强烈的恐惧, 体现出读者导向的阐释选择。

三位译者的处理方式不同, 根源在于他们对“阴森森的”这一氛围词的解读本身就存在差异。朱纯深读出的是“暗得有些吓人”, 杨氏夫妇读出的是“接近恐怖”, 葛浩文读出的则是“令人感到不自在”。解读不同, 补偿方式亦不同。陈顺意(2021) [15]曾指出杨译“侧重内容和意义的忠实”, “almost”的添加确实兼顾了意义忠实与氛围传达。但更进一步看, “almost”所传达的“接近恐怖但尚未到达”这一层意思, 忠实于“阴森森的”这一模糊氛围本身的不确定性。杨氏夫妇用“almost”来调节恐怖感的强度, 正是因为他们读出的是“接近恐怖”, 而非“恐怖”本身。由此, 补偿不再是简单的语义填平, 而是对模糊氛围的审美再平衡。

4.3. 意象与感官模糊表达的翻译

4.3.1. 颜色与质感: “青雾”

原文: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

朱纯深译: ...which, in the floating transparency of a bluish haze from the pond, look as if they had just been bathed in milk.

葛浩文译: A light green mist floated just above the lotus pond.

杨宪益&戴乃迭译: ...and a light blue mist floating up from the pool made them seem washed in milk or caught in a gauzy dream.

“青”在汉语中是独有的模糊色彩, 可指绿色、蓝色或黑色, 译者必须在此作出个人化抉择。三位译者都信任“青雾”作为核心意象的重要性, 但侵入阶段的解读方向不同。朱纯深选择“bluish haze”, 这是一个带蓝的、边界模糊的色彩词, 既指向蓝色, 又保留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同时, 他把“薄薄的”吸收为“the floating transparency”, 把“浮起”融入“floating transparency of a bluish haze from the pond”, 使雾的轻薄、透明与浮动感同时呈现。葛浩文选择“light green mist”, 把“青”读作绿色, 关注“青”与荷叶、绿水的关联; 杨宪益与戴乃迭选择“light blue mist”, 把“青”读作蓝色, 关注“青”与月光、夜色的呼应。三种色彩呈现, 正是阐释学中主观性的生动体现。

颜色既定, 补偿随之而来。朱纯深和杨宪益与戴乃迭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牛奶”的比喻: “bathed in milk”、“washed in milk”。杨戴译本还追加了“caught in a gauzy dream”。这些新增意象是为了补偿单

一颜色词所无法承载的柔滑与梦幻质感。葛浩文则仅以“light”修饰,其译文简洁明快,但在意象的丰满度上做出了让步,反映了葛浩文对“青雾”这一意象的整体处理思路:他更关注颜色的准确呈现与句子的自然流畅,而非在颜色词之外追加感官补偿。

杨玉兰(2008) [11]曾评价朱纯深译文“采用灵活对等的方法,没有机械地对译”,“bluish haze”与“milk”意象的配合正是这一评价的体现。从阐释学角度看,是否在颜色词之外追加意象补偿,取决于译者在理解“青雾”时是否将整体感官效果作为翻译重点。朱纯深和杨氏夫妇关注的是“青雾”的整体质感,因此不满足于仅仅给出一个颜色词;葛浩文关注的首先是颜色的准确呈现,因此选择了更为简洁的处理。这里,“侵入”与“吸收”的界限并不清晰:英语 blue 与 green 两个选项从一开始就在牵引译者对“青”的解读,而译者对“青”的解读又反过来决定他们选择哪一个选项。模糊语言使理解与表达相互渗透,这正是斯坦纳四步骤在诗性文本中需要被动态理解的原因。

4.3.2. 集体形态与质感:“田田的叶子”

原文: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

朱纯深译: All over this winding stretch of water, what meets the eye is a silken field of leaves, reaching rather high above the surface like the skirts of dancing girls in all their grace.

葛浩文译: On the surface of the winding and twisting lotus pond floated an immense field of leaves. The leaves lay high in the water, rising up like the skirts of a dancing girl.

杨宪益&戴乃迭译: As far as eye could see, the pool with its winding margin was covered with trim leaves, which rose high out of the water like the flared skirts of dancing girls.

“田田”二字,既有形态之盛,又有音韵之美,还暗含荷叶在月光下柔滑光洁的质感。杨宪益与戴乃迭的“trim leaves”侧重于荷叶的整齐,葛浩文的“immense field”着眼于荷叶的广阔,两者都吸收了原文的一部分特征,但也无可避免地损失了另一部分。杨氏夫妇的“trim”使荷叶显得修整、齐整,画面清晰,但“田田”所蕴含的茂盛感与音韵美有所减弱;葛浩文的“immense field”突出了荷叶的规模与气势,却同样难以再现“田田”的叠音美感。两者在“弥望”的处理上也各有侧重:杨氏夫妇用“As far as eye could see”保留视觉延展,葛浩文则用“floated an immense field of leaves”将视觉印象融入存在句,更显自然流畅。

朱纯深的“silken field of leaves”则是典型的阐释学创造性补偿。他没有拘泥于形态的描摹,而是敏锐地捕捉到荷叶在月光下柔滑、光洁的质感,并用“silken”一词将其定格。这个词不仅完成了意义上的吸收,更以其自身的典雅美感,补偿了“田田”所负载的茂盛感与音韵美,在更高的艺术维度上实现了与原文的平衡。同时,他将“曲曲折折的荷塘”吸收为“this winding stretch of water”,将“荷塘”转写为“水”,使“winding”与“water”共同营造出曲折绵延的空间感;“弥望”则用“what meets the eye”保留视觉动作。这些选择共同构成了一个以质感与视觉流动为核心的译文世界。

这一平衡的实现根植于朱纯深对“田田”一词的独特理解。“silken”一词的选用说明朱纯深在理解“田田”时已注意到荷叶在月光下柔滑光洁的质感,并将其作为翻译的核心。正因其关注质感而非形态,译文中才会选择“silken”而非“luxuriant”或“dense”。若理解仅止于“茂盛”之义,译文亦难超越“luxuriant”或“dense”这类词汇。童兆升等(2009) [12]曾以“形象生动”评价这一译法,这个判断准确地描述了译文效果。而“silken”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朱纯深在侵入阶段便已捕捉到他人未及注意的质感,为补偿阶段预留了空间。他能以“silken”进行补偿,是因为在理解阶段便已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换言之,补偿并非翻译末端的独立环节,而是侵入阶段解读焦点的延迟实现。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发现

通过对三个《荷塘月色》英译本中模糊语言翻译的对比剖析, 本文在斯坦纳阐释学理论框架下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阐释学四步骤为模糊语言翻译提供了一个动态模型。三位译者对原文模糊语言的“信任”总体一致, 都相信这些朦胧、不确定的表达是构筑美学境界的核心要素。差异主要发生在“侵入”阶段。在“几段空隙”中, 朱纯深的补偿预设于侵入阶段, 葛浩文的吸收本身即补偿; 在“颇不宁静”中, 补偿内化于选词, 吸收与补偿合一; 在“阴森森的”中, 朱纯深的吸收与补偿同步完成, 杨氏夫妇以“almost”调节模糊强度, 葛浩文以“giving one an eerie feeling”进行解释性补偿; 在“青雾”中, 目的语的 blue/green 选项从一开始就参与塑造侵入方向; 在“田田的叶子”中, 朱纯深若未在侵入阶段捕捉到质感, 补偿阶段便不可能出现“silken”。这些案例共同说明: 模糊语言翻译中, “侵入”是决策枢纽, “吸收”与“补偿”常常相互渗透。

其次, 译者的主体性在“侵入”和“吸收”阶段扮演了决定性角色。朱纯深的解读焦点常落在质感、诗学效果与视觉流动性上, 因此其吸收策略偏向意象化与典雅化, 补偿方式多为比喻追加与质感再现, 如将“田田”创造性译为“silken field”以补偿质感的缺失。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解读焦点常落在意义传达、氛围强度与文化传真上, 因此其吸收策略偏向准确、流畅与适度强化, 补偿方式多为程度调节与逻辑补充, 如将“青”处理为“light blue”, 以“almost terrifyingly dark”调节氛围强度。葛浩文作为母语译者, 其解读焦点常落在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空间分布与自然表达上, 因此其吸收策略偏向惯用表达与清晰画面, 补偿方式多为分步解释或简洁呈现, 如用“here and there”巧妙地补偿了“几段”的数量模糊性。这种风格差异在他们对数量词、情感词和颜色词的处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 “补偿”是衡量译者艺术创造力的重要标准。成功的补偿不是机械的对等, 而是在深刻理解原文美学特质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无论是朱纯深以“two or three gaps”搭配“as if specially reserved for the moon”对比喻意境的补偿, 还是葛浩文以“exceedingly restless”对情感强度的补偿, 抑或是杨宪益与戴乃迭以“almost terrifyingly dark”对氛围感的补偿, 都体现了译者为了在目的语中“恢复平衡”所付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 补偿并非翻译末端的独立环节, 而是侵入阶段解读焦点的延迟实现。朱纯深能以“silken”进行补偿, 是因为他在理解“田田”时便已捕捉到他人未及注意的质感。

与既有研究相比, 本文的推进在于: 语料库路径, 如刘爱军(2020) [9]和霍跃红(2011) [10], 能够发现词汇、句式与情感强度差异, 却难以解释差异如何产生; 美学路径, 如杨玉兰(2008) [11]、童兆升等(2009) [12]和杨昊(2015) [13], 能够评价译文的审美效果, 却多将译者选择视为静态结果; 翻译方向与忠实研究, 如黄立波(2011) [14]和陈顺意(2021) [15], 分别揭示了译入、译出差异与忠实的复杂性, 但未将模糊语言作为独立美学范畴加以系统考察。本文以斯坦纳四步骤为动态框架, 追踪三位译者在三类模糊表达中的阐释决策过程, 正是为了回答“差异从何而来”以及“补偿如何可能”这两个既有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的问题。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主要集中在语言层面的对比, 未来研究可结合译者手稿、访谈等副文本资料, 更深入地追溯其“侵入”和“补偿”决策的具体心理过程, 或可引入读者反应研究, 考察不同补偿策略的实际接受效果。

5.2. 模糊语言对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启示

将模糊语言作为考察对象, 也揭示了斯坦纳理论中若干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第一, 斯坦纳论“补偿”, 侧重语义与文化信息的亏空与填平。但在模糊语言的翻译中, 语义的模糊本身就是美学特质的一部分。朱纯深将“田田”译为“silken field”, 并非为补足“茂盛”之义, 而是为补偿被丢失的质感与音韵之美。若补偿仅以语义信息是否完整为标准, “silken field”与“luxuriant leaves”在信息传递上并无本质差别, 但两者审美效果截然不同。斯坦纳的补偿理论缺少衡量审美效果的维度, 这一缺失在分析精确语言翻译时影响不大, 但在分析诗性文本的模糊语言时便会显现出来。所谓“恢复平衡”, 在模糊语言翻译中不仅指语义信息的对等, 更指审美效果的相当。

第二, 在精确语言的翻译中, 理解与表达往往呈现较为清晰的先后次序。但面对“青”这类模糊色彩词时, 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本身便受到目的语表达可能性的牵引。葛浩文选择“light green”, 并非先确定“青”为绿色再于英语中寻找对应词, 而是英语中 green 与 blue 两个选项从一开始便在影响其解读方向。斯坦纳将侵入与吸收描述为先后两个步骤, 但在模糊语言中, 侵入阶段已包含吸收阶段的预判, 吸收阶段又反过来修正侵入阶段的焦点。文本的模糊程度越高, 侵入与吸收之间的界限就越模糊。这一现象带来了提示: 四步骤在面对不同性质的文本时, 其内部关系的紧密程度是不同的。

第三, 三位译者均信任“颇不宁静”的情感分量, 但信任本身并不决定其解读方向。朱纯深读出内敛的“烦乱”, 葛浩文读出强烈的“不安”。这说明面对模糊语言时, 译者信任的不是某一确定含义, 而是这几个字确实值得翻译, 至于往哪个方向翻译, 则是侵入阶段的选择。斯坦纳将信任描述为译者相信原文“言之有物”, 但在模糊语言中, 译者信任的是原文“言之未尽”。信任的对象从“有”变为“未尽”, 意味着侵入阶段的任务是在多个可能意义中作出选择。

参考文献

- [1] 朱自清. 朱自清文集[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7.
- [2] 段小莉. 在转换生成语法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之间: 论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的源起[J]. 中国翻译, 2020, 41(3): 110-117.
- [3] Harding, S. (2014) Schleiermacher's Icoses: Social Ecologies of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7, 227-230. <https://doi.org/10.1080/14781700.2014.885849>
- [4] Marset, M.R. (2013) Teorías de traducción enfrentadas y experiencias de traducción contrapuestas. In: Perez, M.J.F. and Sanchez, L.J., Eds., *Estudios de Traducción: Perspectivas*, Comares, 95-112.
- [5] Romele, A., Severo, M. and Furia, P. (2018) Digital Hermeneutics: From Interpreting with Machines to Interpretational Machines. *AI & Society*, 35, 73-86. <https://doi.org/10.1007/s00146-018-0856-2>
- [6] 杨武能. 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J]. 中国翻译, 1987(6): 3-6.
- [7] 屠国元, 朱献珑. 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J]. 中国翻译, 2003, 24(6): 10-16.
- [8] 余斌. 译者主体性在“对话”与“视域融合”中的彰显[J]. 上海翻译, 2015(3): 45-50.
- [9] 刘爱军.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比较研究——以朱自清散文英译为例[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4): 101-105+16.
- [10] 霍跃红.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学应用研究——以《荷塘月色》的三个英译本为例[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2(4): 69-73.
- [11] 杨玉兰. 论散文翻译中审美效果的艺术再现——以《荷塘月色》的英译为例[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24(6): 102-104.
- [12] 童兆升, 刘国忠, 方英姿, 陈海容. 散文翻译中“韵味”再现的层次性[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3(4): 78-83.
- [13] 杨昊. 从翻译审美主客体看《荷塘月色》英译本[J]. 语文建设, 2015(36): 67-68.
- [14] 黄立波. 译出还是译入: 翻译方向探究——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考察[J]. 外语教学, 2011, 32(2): 96-101.
- [15] 陈顺意. 文学翻译的忠实: 以《荷塘月色》七译本为例[J]. 中国翻译, 2021, 42(5): 158-165.
- [16] (美)乔治·斯坦纳. 巴别塔之后: 语言及翻译面面观[M]. 孟醒,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17] 伍铁平. 模糊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8] 张乔. 模糊语义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9] 余富斌. 模糊语言与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10): 49-52.
- [20] 张虹. 论模糊语及其特征[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08(2): 57-59.
- [21] Channell, J. (2000) *Vague Languag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